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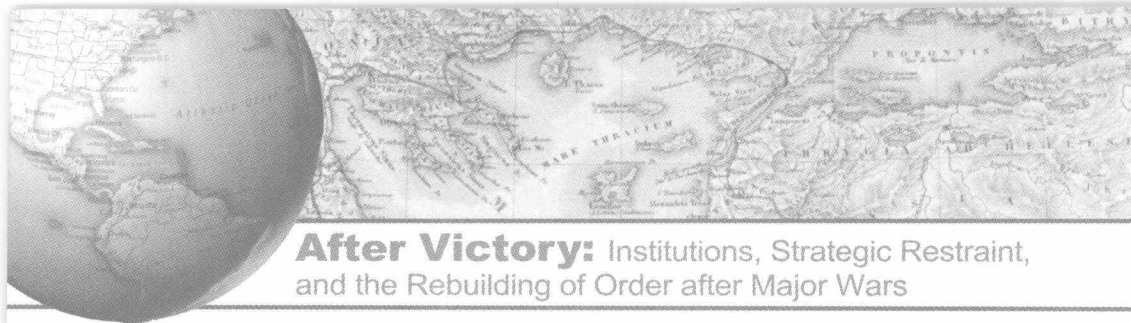
# 大战胜利之后

## 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美]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著  
门洪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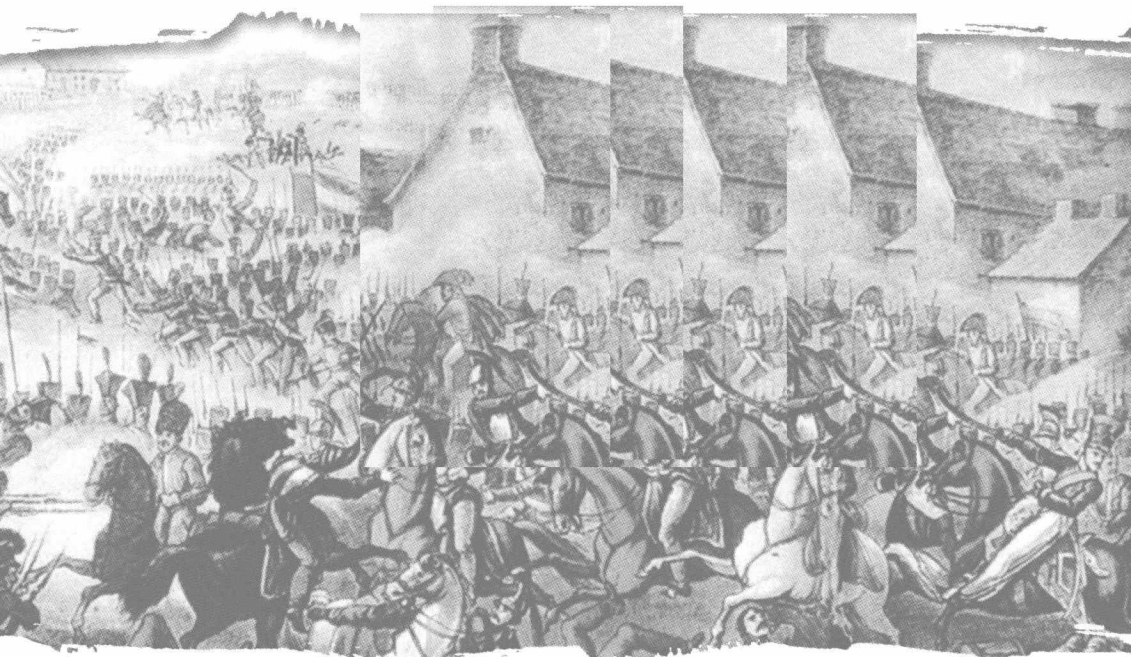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 大战胜利之后

## 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美〕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著  
门洪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66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美)伊肯伯里著;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4239-4

I. 大… II. ①伊… ②门…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近代 ②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现代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1542号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by G. John Ikenberr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1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著作责任者:[美]约翰·伊肯伯里 著 门洪华 译

责任编辑:徐少燕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239-4/D·213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8.75印张 287千字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象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大战略



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①</sup>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

可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 译序

## 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逻辑

国际秩序建构是大国战略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大战之后领导国的战略选择尤其是确立国际秩序的关键。但正如历史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指出的:“国际关系研究对国际秩序如何出现及其变迁关注甚少。关于战后如何处理战败国,唯有少数关于均势理论的文献触及,政治学者将这些问题交给了外交家和历史学家,由他们来评估获胜大国以往如何处理战败国以及将来应该怎样做。”<sup>①</sup>鉴于此,2001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堪属填补学科空白之作。本书是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的代表作,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并称美国战略研究的两大高峰,也是自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出版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秩序著作。<sup>②</sup>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2002年度最佳国际历史与政策著作杰维斯-施罗德奖(Winner of Robert L. Jervis and Paul W. Schroeder Prize),并成为战略研究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大战胜利之后》以领导国战略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为主题,研究1815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强调领导国战略选择的决定性意义,被视为架起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的沟通桥梁之作。

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大战胜利之后》一书进行评价:第一,约翰·伊肯伯里其人其文,探究为什么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学术名著;第二,《大战胜利之后》在分析国际秩序建构方面的里程碑地位,评述该书的学术价值;第三,结合伊肯伯里关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sup>①</sup>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pp. 161—186.

<sup>②</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的最新论述,探究《大战胜利之后》对中国秩序战略的启示意义。

## 约翰·伊肯伯里的学术征程

约翰·伊肯伯里,生于1954年10月5日,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Albert G. Milbank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伊肯伯里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和政府具有广泛的影响,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中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他以经历丰富、精力充沛、成果丰硕著称于战略研究界。

伊肯伯里熟谙美国的“旋转门”制度,长期以来流转于学术界、政策界和政府部门之间,使其研究成果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亦有实践作为背景支撑,其远见卓识由此得以锤炼,诸多实践检验也确保了其研究成果的敏锐和针对性。

伊肯伯里1985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伊肯伯里就曾获得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资助,担任1982—1983年度研究员。1984—1992年,伊肯伯里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其中1991—1992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同时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事务研究员,兼跨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两界。此后,他全职投入政策研究,1992—1993年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美欧关系;1992—199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未来委员会高级研究顾问;1993—1994年领导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及其不满”的研究小组从事民主研究,并将其研究视角拓展到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94年,伊肯伯里进入不惑之年,其人生道路选择亦日渐定型,其标志就是自此全职投入学术界。1994—2000年伊肯伯里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000—2004年执教于乔治敦大学,2004年至今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求建立学术研究、政策分析和政府服务三者之间的桥梁。其间,他1997—2002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1997—1998年获得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助,在国际政策研究所(日本东京)担任日立国际关系研究员;

1998—1999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访问学者；2003—2004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年度顾问团成员。他获得多国、多项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支持。尤其是他获得美日基金会(the U. S. -Japan Foundation)、全球伙伴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Global Partnership)的资助,主持“美日在地区安全和治理上的协作”(United States and Japanese Collabo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多年度项目;获得2002—2004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助,研究跨大西洋关系,为其研究西方国家间合作和美国联盟战略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些经历和学术积淀最终使其迎来了一个影响世界的重大机遇。2004—2006年他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共同主持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组织美国政学研各界四百多位知名人士为美国21世纪的安全战略做出全面规划,普林斯顿项目最后报告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伊肯伯里多年研究和经历的结晶。<sup>③</sup>

伊肯伯里的学术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战略起步,多年来把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大战略、国际关系理论、跨大西洋关系、美日关系、西方秩序作为研究核心,最近则逐步将其研究重心转向亚洲,并对中国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他长期致力于杂志和丛书编辑工作,1985—1992年担任《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副主编、主编,目前仍担任编委会成员;1998年至今担任《外交》(*Foreign Affairs*)政法著作的评论人;1999年至今担任《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联合主编;1999年至今担任《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编委;1997年至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国际关系丛书编委;2001年至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历史与国际关系丛书联合主编;2002年至今担任东西方中心东亚丛书编委等。此外,他在世界各地讲学,学术足迹遍及美、欧、亚。根据伊肯伯里自己提供的资料,2002年他在美国发表演讲15次,到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芬兰、西班牙、中国等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9次,

<sup>③</sup> 关于普林斯顿计划的系列研究成果,参见:<http://www.princeton.edu/~ppns/report.html>。

平均半月发表一次演讲,这还不包括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主持的研讨会、演讲会,其学术影响力和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广泛的研究兴趣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伊肯伯里能够做到著作等身、重量级学术论文频频见诸学刊。他在美欧所有重要学术期刊上均发表过宏论,在诸多政策性杂志发表见解,还是《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粗略划分,伊肯伯里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包括:《美国外交政策论文集》(*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1988, 主编);《论国家》(*The State*, 1989, 联合主编);《国际关系新思维》(*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7, 联合主编);《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3, 合著);《遭受质疑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Question*, 2003, 联合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2003, 联合主编)。伊肯伯里关于美国战略的著作包括:《国家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The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88, 联合主编);《国家理性:石油政治与美国政府能力》(*Reasons of State: Oil Politics and the Capacitie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1988);《美国促进民主:动机、战略及其影响》(*U. S.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2000, 联合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2002, 主编);《美国与东北亚》(*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 Old Issues, New Thinking*, 2007);《确定方向:关于美国大战略的争论》(*Finding Our Way: 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008, 合著)。伊肯伯里关于西方关系(含跨大西洋关系和美日关系)的著作包括:《大西洋边疆:美欧关系新议程》(*Atlantic Frontiers: A New Agenda for U. S. -EC Relations*, 1993, 合著);《改造同盟:变革时代的美日安全伙伴关系》(*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2003, 联合主编);《制度功效:美国、日本与东亚治理》(*The Uses of Institutions: The U. S., Japan,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2007, 联合主编)等。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包括:《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2001);

《自由秩序与帝国野心》(*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2006);《西方的终结:大西洋秩序的危机与变迁》(*The End of the West?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Atlantic Order*, 2008, 合著)等。目前他正在撰写题为《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体系的起源、危机与转型》的著作,即将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纵观伊肯伯里的学术历程,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其民主制度为探究问题的出发点,美国战略是其研究的重心,而国际秩序是他所关注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起步开始,伊肯伯里就把国际秩序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学术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国际秩序的探索是分不开的,亦与国际秩序变迁受到重视的全球情势分不开。他在《大战胜利之后》前言中指出:“我对战后重要历史关头及和平安排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关于美国霸权特征及其意义的探讨如火如荼。我不仅对美国霸权的衰落感兴趣,而且关注霸权秩序如何首创,以及更一般意义上政治秩序如何创立”。这种长期关注的秉持,最终使他成为国际秩序研究上最权威的理论学者。从理论取向上看,伊肯伯里的基本理论核心是自由主义,但他并不像其他自由主义学者一样抵制现实主义的作用,而是结合二者<sup>④</sup>,并强调建构主义的价值。<sup>⑤</sup>这种理论融合运用体现了战略研究不拘一格的理论视野,可以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杰出战略研究者的应有素质。<sup>⑥</sup>这样一位学者的理论积淀、战略视野和学术成就足以为学界所看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他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是同时代最富天才的国际关系学者”<sup>⑦</sup>。

<sup>④</sup> 他与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格里科的合作堪称经典,参见 Joseph M. Grieco and G.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sup>⑤</sup> 如下文章可以明确体现出伊肯伯里对建构主义的建设性态度:G. John Ikenberry and Jitsuo Tsuchiyama,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 2002, pp. 69—94。

<sup>⑥</sup> 笔者曾指出,大战略学者(Grand Strategist)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sup>⑦</sup> 参见:<http://www.polity.co.uk/book.asp?ref=9780745636498>。

## 《大战胜利之后》的学术价值

### 探究大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战略意义

国际秩序是大国的核心国际战略议题。进入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进程和标志均与国际秩序相关,大国首先崛起于所在地区,并逐步向全球扩展其影响,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均将因此而震动。堪为作证的是,冷战结束前夕,大国领袖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事务(如裁军等),而是国际秩序的走向,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布什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均体现了这一点。<sup>⑧</sup>

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换言之,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sup>⑨</sup>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因此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必然是巨大

<sup>⑧</sup> 相关分析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第328页;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

<sup>⑨</sup> 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3—142页。

的。赫德利·布尔指出,大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是因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国家实力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大国也可能采取有助于维持或损害国际秩序的政策。布尔指出,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在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鉴于此,大国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sup>⑩</sup>然而,冷战结束已近二十年,国际秩序却依旧处于转型之中,“美国如何管理和平依旧是处于当代国际政治核心的首要问题”,而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开改造国际秩序之先河,导致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sup>⑪</sup>

理解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历史经验教训的回溯。在这个意义上,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理论和政策研究具有开创性,通过《大战胜利之后》及随后进一步的探究,伊肯伯里就上述问题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

##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要内容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题是,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本书确定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关涉三个核心问题:面对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本书勾勒出1815年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注目。

《大战胜利之后》首先总结国际秩序的类型,指出均势、霸权和宪

<sup>⑩</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p. 199—222.

<sup>⑪</sup> 门洪华:《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一项历史分析》,《远景基金会季刊》(台北)2006年第3期,第37—73页。



政秩序呈现递进态势,而宪政秩序是围绕分配权利、制约权力行使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突出了战略约束对领导国的战略价值。其次,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逻辑,其基本思路是对国际秩序建构战略进行理论批评,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作者从对国际秩序源泉的争论开始,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传统秩序思想进行批评,致力于超越现实主义过分关注权力作用和自由主义所秉持的理性主义和契约制度理论,提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作者概括指出,在战后关头,领导国有三种重大选择:运用于其实力主导弱国和战败国;抛弃他国,回国专注于自身发展;运用其强大的实力地位获得认可,并参与到一个彼此接受的战后秩序之中。而领导国期望将其一时的控制性实力地位转化为长期的持久优势,战后创立合法秩序的动机使得宪政安排颇有吸引力。新的领导国约束自己,同意对自己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换取其他国家对其规则和制度进程的同意,以确保战后秩序的持久性和可预期性。对强国而言,制度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够有效地消除某些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后果,限制其他国家的未来所得;对弱国而言,制度妥协排除或至少降低了它们所担心的某些后果带来的危险(如被强国所主导或抛弃)。达成协议之后,制度黏性将增强战后协议的稳定性。作者认为,随着时间的变迁,战后安排趋于制度化秩序的方向,开始带有宪政特征,实力通过大家均同意的制度规则和惯例来展示,从而限制了各国随意滥用实力或利用其实力谋取对弱国的永久优势的能力。作者强调,这是一个理想模式(ideal type),战后重大安排均非完全符合这一理想逻辑,但它有助于进行历史分析和未来展望。第三,作者通过对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秩序建构的分析验证以上理论假设。1815年的案例表明,领导国英国试图将制度作为约束权力的机制,开始出现了某些宪政秩序的印迹,但由于参与国的非民主化特征,约束性制度的建设是有限的。1919年,战后西方列强普遍采用民主制度为达成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机遇,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制度创意,欧洲寻求将美国拖入安全承诺之中,制度性协议变得唾手可得。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国的敏感,尤其是在面对盟国利益冲突之际,伍德罗·威尔逊对法律和制度来源的顽固信念、美国实力使用不当、错过的机遇使得战后安排的失败成为必然。1945年的历史关头为领导国和次要国家确立制度安排提供了最为显著的动机和

能力。美国更有能力与其他国家达成制度协议,美国国内体制的特征和约束性制度的普遍采用有助于限制其实力的回报,实力高度失衡使得欧洲各国迫切期望签署协议,各国的民主特征使由此而达成的制度安排更为可信和有效,多边的、互惠的、合法的、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秩序就此构筑起来。第四,作者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分析,认为1989—1991年的剧变只是摧毁了二战后的两极国际秩序,民主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秩序稳如磐石。鉴于新的权力分配正在形成,有必要重新检视以往的战后安排。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寻求制度建设议程,力图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建立和扩展地区性、全球性制度,将制度作为将其他国家锁定在所期望的政策倾向上的工具,并愿意对自己的自主权进行某些限制;其他国家也把制度视为获得接近美国的途径。这一制度建设模式可被视为西方战后安排逻辑的延续。第五,本书最后探究了这一分析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启示。作者强调,鉴于权力的低回报和制度的高回报,实力最持久的国家是那些进行制度合作并通过制度使用其实力者。进入21世纪,美国成为世界上孤独的超级大国。作者提醒美国决策者谨慎地运用其权力,美国巨大的实力优势能否很好地用于创立持久而合法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在国际制度内运用实力和进行运作。

## 对《大战胜利之后》的肯定与批评

《大战胜利之后》出版后好评如潮。本书理论周延、分析透彻、论述规范,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最佳典范之作。<sup>⑫</sup> 笔者通过国际秩序分析的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从战略角度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则非本书莫属。

《大战胜利之后》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国际秩序建构中的经验教训,阐述主导国的战略选择及其成效,从而总结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由此确立了本书在探究国际秩序建构逻辑方面的里程碑地位。可以说,严密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历史案例的实证分析确保了本书的这一地位。在理论建构上,本书将自由主义

<sup>⑫</sup> Christopher Coker, "After Vic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 2002, pp. 265—266.

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和实证框架,对处于国际政治和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国际秩序建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对霸权国如何从推进约束和承诺获益进行了迄今最具说服力的理论解释。<sup>⑬</sup>尤其是,作者关于领导国之民主制度的强调秉持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以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价值趋向的制度战略颇具启示意义,亦从战略高度发展了自由主义秩序理论。进而言之,本书将国内民主制度与国际秩序的进化结合起来,体现出“民主和平论”的延伸。作者强调,从1945年安排及1989年之后的安排来看,接触或扩大约束制度的提议显然与各参与国的民主特征相关。唯有通过扩展民主美国才得以超越均势秩序,美国本身的开放特征和多边制度网络造就了当前秩序的宪政特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者强调,约束和承诺并非是主导国之领导地位的敌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伊肯伯里堪称天才型的大战略家。他进而指出,随着主导国做出承诺、限制自身权力的能力逐步增强,霸权国建立稳定而合作秩序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民主的扩展和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际秩序超越了简单的均势政治,而体现出宪政特征。从实证分析上,本书将对美国战略的剖析纳入历史画卷的纵向梳理中,对美国实力及其战略进行了辩证而富有远见的分析,并对其秩序战略进行了展望。作者以权力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如何运用美国实力提出了堪称远见卓识的建议。尤其是,小布什上台以来的战略转折促使作者进一步思考。作者将之归结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强调以单边和先发制人方式展现的美国实力引起争议并令全球不稳定,布什外交政策将继续遭受失败。<sup>⑭</sup>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伊肯伯里进一步指出,美国彻底调整方向代价高昂,且非明智之举。美国可能的战略调整是,继续多边秩序内运行,最有可能的选择不是单边帝国或新孤立主义,而是全球性的“轮辐”双边主义(“hub and spoke” bilateral agreements),相比多边协议而言,轮辐双边协议使得美国更全面地将其权力优势转化为其他国家

<sup>⑬</sup>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pp. 161—186.

<sup>⑭</sup> 以上观点来自作者2004年11月1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主题演讲,译文参见约翰·伊肯伯里:《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门洪华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3—108页。